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權力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Practi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doi:10.30390/ISC.199803_37(3).0002

問題與研究, 37(3), 1998

Issues & Studies, 37(3), 1998

作者/Author： 陳文賢(Vincent Wen-Hsien Chen)

頁數/Page： 19-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3_37\(3\).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3_37(3).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權力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

陳文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所副研究員)

摘要

權力平衡理論提供觀察冷戰結束後亞太安全情勢轉變的一項觀念架構，也提供區域內中共、日本、俄羅斯及美國四強權及東協領導人在政策制訂及政策選擇上的彈性空間。上述強權的互動似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每兩強間的合作與疏離均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亞太的權力平衡，進而衝擊亞太地區的安全情勢。亞太處此區域秩序變遷的時刻，加強東協區域論壇的功能，應有助於減少四強戰略互動所可能引起的疑慮與猜忌，甚或可進一步提供必要的規範以促進良性的互動，而有益於亞太的安定與和平。亞太地區若能藉權力平衡維持區域穩定，同時東協區域論壇亦能漸進的發揮功能，則東協區域論壇未嘗不可能成為亞太邁向集體安全的先驅。

關鍵詞：權力平衡、亞太安全、東協區域論壇、戰略互動

* * *

壹、前言

權力平衡的觀念在國際關係學內已有相當長的歷史，然而將權力平衡做為一種國際關係的理論探討時，卻仍經常引起國際關係學者對其觀念內涵的爭論。不過，在以權力平衡理論探討國際關係時，權力平衡是經常被視為是一種國際情勢，而「平衡」(equilibrium)則成為說明國家間權力關係的中心概念。^①權力平衡的過程即是一種

註① 權力平衡有其長遠的歷史淵源，也正因為如此，權力平衡被賦予多種意義以解釋在不同的國際體系下所呈現的權力之間的關係。國際政治學者也因而整理出相當多有關權力平衡的定義。也運用權力平衡的觀點來解釋歷史上重複出現的國際關係類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及冷戰時代的東西方對抗均為權力平衡的顯著例子。此外，從歷史所提供的實例看，權力平衡則常為大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有關對權力平衡理論的探討及歷史實例的分析，詳見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維持國際體系平衡的情勢，國家常藉各種不同的手段企圖維持平衡以尋求國家安全。因此，就國際政治而言，權力平衡最主要的功能即在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及保障構成此一體系之國家的存在。^②

因為權力平衡涉及到國家間權力分配的狀況，而權力分配是否大致均勻又影響到國際情勢的穩定。一般而言，如果權力的分配並未讓任一特定的國家或同盟造成對其他國家的威脅，則該項形式的權力分配是在被容許的範圍內，^③也可避免在國際間產生霸權。如此，權力平衡就能發揮維持國際穩定的主要功能。也因此吾人可視權力平衡為維持國際安定的條件，而政策制訂者則可能以追求權力平衡為一項政策，國家所從事的外交、結盟甚至戰爭即成為落實此項政策的手段。

在現實的國際政治上，政治人物也常以常識及經驗認知的權力平衡的觀點，做為他們在策畫整體國家戰略或在外交政策制訂上的一項主要考量。同時，權力平衡理論也提供決策者政策選擇的彈性空間，避免使他們只能針對特定事件做一些臨時反應及對策。因此，權力平衡論也讓政治領導人在政策制訂上可以更為理性並顧及全面局勢。

亞太地區本為世界強權所處的地區，因為經貿成長的快速，加以朝鮮半島、南海諸島及台灣海峽等可能引爆軍事衝突之地區亦在本區域內，因此在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更成為國際政治注目的焦點。而中俄等國反霸權的聲明，及區域內隱含有平衡中共勢力及平衡美國影響力等之趨勢，均相當程度反映了權力平衡理論所探討的一些主要問題，例如，防止區域霸權的興起，穩定國際體系、確保區域安全及維護個別國家的生存等。

然而本文的重點並不在於探討權力平衡論在國際關係史上的發展，也不在於進一步釐清權力平衡觀念本身應具有何種內涵。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瓦爾茲（Kenneth N. Waltz）即曾指出：「若有任何國際政治的政治理論，則權力平衡理論即是。然而吾人卻不易找到一項大致上可被接受對於權力平衡理論的敘述。」^④可見其理論內涵的分歧。不過，權力平衡的觀念經常被用來解釋戰爭的發生和國家行為的誘因及限制，甚至於被用來解釋國際政治出現的規律性等。^⑤因此，本文乃藉權力平衡理論所強調的目的及功能，說明亞太地區主要強權從冷戰結束迄今，在權力消長及形勢易位

註②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81), pp. 23~26.

註③ Michael Sheehan, *op. cit.*, p. 4.

註④ 原文為 "If there is any distinctively pol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theory is it. And yet one cannot find a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that is generally accepted." 請見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 117.

註⑤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

的情況下彼此之間的互動，並探討這些互動對亞太區域情勢的衝擊及對亞太新區域秩序形成的可能影響。本文的另一項主要目的亦在於佐證，儘管權力平衡觀念一直處在模糊與爭論的情況，卻仍不失為政策決定者在追求國家利益及促進區域安定時的一項主要的觀念架構。

貳、權力平衡與亞太的區域秩序

以美國與蘇聯為主的兩極體系，在冷戰時代即廣泛的被認為終將被多極體系所取代，而此一多極體系則包括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及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取代了前蘇聯在國際組織的地位。歐洲共同體則因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簽署，成為在政經統合上再向前邁進一大步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特別是東西德的統一及部分東歐國家的加入，使歐洲聯盟更具影響力。歐盟也相當重視亞太事務並積極展開與亞太國家的對話及合作，例如一九九六年在曼谷舉行的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及一九九七年二月東協七國的外交部長與十五位歐盟會員國的外交部長也在新加坡舉行會談。美國則以其在亞太的駐軍及與區域內國家間密切的經貿關係，而對亞太事務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準此以觀，在亞太地區可以說已經具有上述多極體系的雛型。

在亞太地區多極體系形成的過程中，區域的穩定為亞太國家所共同關切，權力平衡應可發揮在此一過程中維持區域安定的作用。東西方冷戰以來，東亞國家的領導人雖常以權力平衡做為政策制訂的思考方向，但在東亞國家傳統上有關安全的文化中，權力平衡的概念與政策卻幾乎是外來的。^⑥以中國與日本的歷史而言，宗主封邑的系統相當有別於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有謂即便以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為例，各領地及城邦的君王認為維持一種宗主與封邑之間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於追求及保護本身的自主獨立。^⑦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國家所採取之政策，其目的並不在於抗衡，而在於藉此種政策追求現狀的維持，並建立多邊的對話管道，並進一步追求在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以降低軍事衝突的機會。

因此，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或簡稱 ASEAN）不願意採取一種集體防衛的措施，或建立一種集體防衛的架構，主要原因即是東協認為集體防衛將被視為是對特定第三者的挑釁，對於促進區域穩定並無助益。更何況東協成員之間也有領土的糾紛。因此東協希望採取一種非軍事、非意識形態及非衝突性的途徑來強化區域的穩定。東協認為援引西方之安全概念或模式的做法，對東南亞國家以經濟發展及社會和諧為主要內容的國家安全概念，可能會產生適得其反的威脅。因此

註⑥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

註⑦ Nicola Baker and Leonard C. Sebastian, "The Problem with Parachuting: Strategic Studies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0 (1996), pp. 16~18.

若想依循歐洲安全及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而成立亞洲版的安全合作會議，即可能會使西方國家因強調人權及生態環境保護等議題而與東協所主張的安全概念有所衝突。^⑧

在後冷戰時代，亞太國家所持的權力平衡觀點可以說是一種多面向的平衡。例如日本即思以和美國密切的關係及對俄關係的改善來平衡中國崛起的勢力，北京則以中俄關係的改善來平衡美日想主導亞太政經體系的企圖，俄羅斯則藉與中共及日本關係的改善來增進其在遠東之人民及領土的安全，並確保俄國在亞太新政經秩序的形成中扮演主要的角色等。有關上述強權間的互動將申論於後。

東西方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一直被廣泛的認為是一個相當具有潛伏性區域衝突的地區。儘管亞太地區持續而快速的經濟成長，仍舊受到國際間的矚目，但是東亞國家普遍增加的軍費支出，卻相當引起國際間的關注。東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上唯一增加軍費支出的地區，據統計，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四年之間，東亞國家就進口了約六百七十億美元的武器。中國、日本、台灣、印尼、南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都增添海空軍武器，同時也增加這些國家在離開本土的作戰能力。^⑨同時，台海問題、南海諸島的主權爭執及朝鮮半島等問題，則更加深亞太地區充斥這種潛伏性衝突之危機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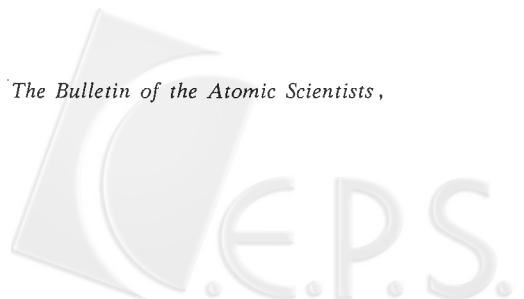
此外，美國關閉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及裁減駐日韓的駐軍，被認為可能會形成亞太的權力真空。雖然多數亞太國家認為美軍之續留東亞地區有助於維持區域的穩定，但是也有國家持不同的意見，惟恐美軍之續留亞洲反易引起區域內國家的對立。大體而言，東協成員認為美國在亞太扮演一個平衡及參與的角色對亞太區域安定相當的重要，由於美國在亞太安全事務的參與，使日本在安全上較無顧慮，也使日本在軍事防衛力量的加強方面不會朝威脅到鄰近國家的方向發展。中共可減少對日本的戒心，並比較可能在國際間共同可以接受的規範內進行其軍事發展。一九九三年的東協會議所發表的主席聲明（the Chairman's Statement）即指出：「美國的繼續立足於東亞，及美國、日本與中國和區域內其他國家之間的穩定關係將有助於區域的穩定。」^⑩

基本上亞太地區的政治勢力版圖，仍不外以美、日、中共及俄羅斯四國間的互動為主軸，而亞太安全情勢的持續與演變，也與該四強權所持的安全與政治策略及彼此間之互動息息相關。亞太地區目前仍處於冷戰結束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轉變期，可預見的是區域內四強對未來亞太情勢的走向，會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有更大的發言權及影響力。在亞太區域秩序尚未建立之前，權力平衡相當程度的會成為亞太各強權維持區域穩定的主要手段，其間的縱橫捭闔也潛藏著各強權想達成權力平衡之動機與目的。

註^⑧ *Ibid.*, pp. 24~29.

註^⑨ Michael Klare, "East Asia's Militaries Muscle Up,"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7), p. 56.

註^⑩ Michael Leifer, *op. cit.*, p. 20.



叁、多面向的亞太強權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冷戰結束後，亞太國家並未發生類似前南斯拉夫解體後所引發的軍事衝突，但是由於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及南中國海群島的主權糾紛等，使亞太地區於未來在軍事安全方面也充滿著不確定感。亞太國家希望維持區域穩定俾便專心於經濟發展。然而冷戰時代之兩極體系的消失，及亞太地區缺乏一些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使亞太的區域穩定相當程度的必須依賴亞太強權間所維持的一種均勢。而目前亞太區域最主要的強權則為中國、俄羅斯、日本及美國，四強的互動則充分反映出權力平衡理論所揭櫫的防止霸權的形成、維持體系穩定及確保各強權行動的自主性等之目的及功能。

一、亞太安全的支柱：美日安保條約

對日本而言，在日本與中國因歷史及地緣政治的關係兩國仍互相深懷戒心，及日俄兩國仍有日本北方四小島領土之爭執的情況下，美日關係的加強似乎仍是日本處此亞太安全情勢尚未明朗之時用以維護日本安全的最佳選擇。不過日俄雙方均有意增進兩國間的關係，葉爾欽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在參加與美國丹佛市召開的七工業化國家的元首高峰會中，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會談，並提出俄日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計畫。橋本則於同年七月發表對俄羅斯的新政策，謂此一政策將基於「信任、互利和長程的觀點」。^①日本願暫時將領土爭執的問題擺在一邊而增進與俄羅斯的經貿關係。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橋本與葉爾欽於西伯利亞的克瑞士諾亞斯克（Krasnoyarsk）市舉行的非正式高峰會，即被認為是象徵日俄將從兩國的「政治調適」期（political accommodation）邁向「合作交往」（cooperative engagement）的階段。^②雙方並允諾將努力促使於西元二〇〇〇年之際簽訂和平條約。

美日之間的共同防禦條約，被兩國政界人士廣泛的認為是維護兩國國家利益及維持亞太地區安定與和平的礎石，橋本也在東亞國家及日本國內對美國駐軍在亞太地區所扮演之角色有所疑慮之時，特地在美日高峰會議中表示日本對美國駐亞太軍隊的全力支持。如同橋本所說，美國在亞太的駐軍是受歡迎的，橋本並認為美軍的駐留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而亞太地區的穩定是區域內最重要之事。^③事實上，除此之外，美日安保條約亦有防止日本被形勢所迫而重新武裝之作用。因為一旦美國大幅減少駐日韓美軍，或美國無法落實維護美日共同安全利益的承諾時，則在中共及俄羅斯都擁有核子武器和北韓可能擁有核武的情況下，不能完全排除日本為了維護本身的安全及國家利益而走向發展核武能力一途之可能性。雖然日本核能基本法及反核三原則均明

註① Landers and Blagov, *op. cit.*, p. 30.

註② Cameron W. Barr, "Russia, Japan Try to Thaw N. E. Asi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3, 1997, p. 6.

註③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32, No. 16 (April 22, 1996), pp. 673~674.

文禁止日本擁有核子武器，但是一些日本學界人士認為，發展具有嚇阻性質的核武能力會被認為是一項防禦手段而不違憲。^⑭而日本是否會走向發展核武能力一途，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即在於美日同盟的強度，此點也一直是美日政學界所相當關心的議題。^⑮

一九九六年三月中共在台海的軍事演習，使得原本因三個駐琉球美軍強暴日本女學童的案件而陷入低潮的美日關係又忽見曙光，美日之間一再出現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暫時被擱置一旁，代之而起的是美日共同關切的安全議題。一九九六年四月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首相的高峰會議，最主要的目的即在探討美日兩國在防衛合作上的問題。橋本與柯林頓發表美日共同宣言，稱此項已有三十六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將一秉其重要性而邁入第二十一世紀，亦即是所稱的美日「二十一世紀的同盟關係」。雙方並同意修訂訂於一九七八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美日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公布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將原有日本周邊有事的地理概念改為視事態的性質決定合作的範圍。依據新美日防衛合作方針，一旦美國捲入日本周邊地區的軍事衝突，日本將提供美軍在掃雷、救援及在公海上使用其軍艦等方面的合作。^⑯安保宣言除了敦促兩國加強政策上的調和及對有關影響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之情勢的雙邊合作外，更將美日安全條約以防衛日本為主體的範圍擴大到對日本鄰接區域的關注。^⑰不過，日本官員對美日聯合防禦的範圍應包括臺灣海峽的說法，引起中共人民日報的強烈批評，認為日本企圖以此干預中國的內政。^⑱

然而美日高峰會議對於美日安全關係在亞太地區未來可能面臨的難題均略而不談，譬如：美日間持續的貿易摩擦是否會影響兩國的安全關係？美國民眾也批評日本未能以實際行動來證明日本願意積極參與並重視美日的安全關係，從波斯灣戰爭一例中即可看出，日本只願意分擔軍費，但卻不願意參與軍事行動。^⑲對於更高層次的戰略問題，例如，美日安全關係應如何定位等問題，美日兩國領導人物均未給與明確的答案。^⑳

美國想要在迅速變化中的亞太地區持續發揮影響力，則美國的亞太政策必須考慮到區域內國家在亞洲所處的位置、利益之所在及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美國與中共及

註⑭ *The Japan-U. S. Alliance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East Asia*, A workshop report prepared by Ralph Cossa, Atsumasa Yamamoto, and Margo Cooper (Alexandria, VA: The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1995), p. 13.

註⑮ *Ibid.*, pp. 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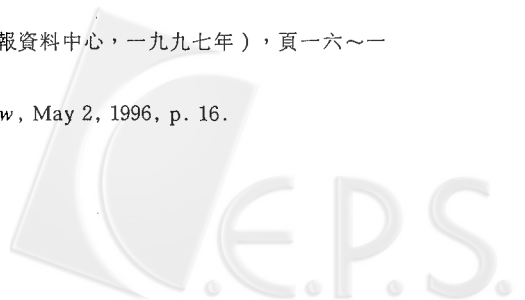
註⑯ *Facts on File 1997*, p. 737.

註⑰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即認為美日防衛合作的區域應包括台灣海峽，他認為日本對中國大陸可能的對台軍事行動有很大的憂慮，日本自衛隊不會介入台海危機，但對美軍提供後勤支援則屬必須。見“Defense Review Covers Taiwan: Kajiyama,”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8, 1997, p. 1.

註⑱ 見中國外交，一九九七年第八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一九九七年），頁一六～一八。

註⑲ “Cracks in the Armou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 1996, p. 16.

註⑳ *Ibid.*, p. 14.



日本的關係。基本上，柯林頓政府在台海危機之後，即派遣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訪問北京，成爲一九九四年美國國防部長裴利訪問北京以來美國最高層次的政府官員訪問中共，美國希望與中共關係修好的意向已相當明顯。美國的此一外交作爲，亦應有不願意因美中關係的倒退而影響到美國與亞太國家之關係的意義，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對美國而言，日本仍舊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邦。

不過，美日安保條約仍無法避免被視爲是美日兩國針對中共的戒心而設，因此，美日爲消除中共的疑慮，在美日共同宣言簽署之前，美國即向中共保證，該項宣言不是以中共爲標的，中共的駐美大使館也得到美方的簡報，而日本更是派遣特使到北京去解釋新安全協定的意義。^②

另一方面，美國要求日本分擔更多維護日本安全與亞太和平與安定的負擔。日本在一九八〇年代才打破其防衛經費不得超過 GNP 之百分之一的限制，同時也參加了美國主導的戰略防衛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一直到一九九二年六月，日本國會通過了 PKO 法案，准許日本政府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任務，這也是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首次派遣自衛隊赴國外參與國際安全事務。^③日本也希望藉漸進的方式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來提升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同時也有爲爭取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而鋪路的用意。

一九九一年初的波斯灣戰爭是一個提供日本得較積極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重要原因，日本雖然提供龐大數目的金錢援助，但因爲未能提供人力與武器的支援，而未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日本由於在安全問題上過度的倚賴美國，以致於被認爲，儘管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日本卻無能協助東亞國家因冷戰的結束分享「和平喘息」，反而是東亞各國增加軍費上的支出。此外，日本也無法在區域內裁減武器的議題上做出貢獻。綜上所述，有日本學者認爲，日本必須真正的面對它在二次世界大戰對亞洲國家侵略所造成的傷害，也必須誠意的和俄羅斯妥協，同時日本更必須擺脫在國家安全上過度倚賴美國的政策，則日本才有可能追求一個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④

日本對於亞太四強在東亞安全策略上的互動也相當的敏感，在美日一九九六年四月的高峰會議後，日本旋即派遣防衛廳長官訪問莫斯科，一方面希望緩和中俄高峰會議帶給日本的衝擊，一方面也強調日本準備與莫斯科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來提升日俄間互信的層次。從東京方面刻意避談與俄羅斯之間的「北方領土」主權之爭一事即是一例。此外，日本更進一步表示願意投資俄羅斯國防及太空工業的意願及興趣，諸如購買俄羅斯的 MiG-29 及 Su-27 戰鬥機等。^⑤由日本對中俄日三國之間互動關係的重視，

註^② Frank Ching, "U.S.-Japan Ties Reinvigorate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 1996, p. 40.

註^③ Jiro Yamaguchi,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Richard Leaver and James L. Richardson, eds., *The Post-Cold War Order: Diagnoses and Prognoses*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68~171.

註^④ *Ibid.*, pp. 173~179.

註^⑤ Yossef Bondansky, "Russo-PRC Axis Changes Balance," *Defense & Foreign Affairs* (London), April 30, 1996, p. 10.

亦可看出日本對於俄羅斯在亞太權力平衡上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的重視。

未來在亞太的權力結構中，日本會成爲中共的強勁對手，中共仍深恐日本再度興起軍事主義，因此，對有關美日軍事方面的合作均相當在意。中共也深知只有在美日同盟關係下，日本較無充份的理由強化其本身的軍事武力，中共也無須去面對另一個潛在的軍事強國，但是北京也擔心，被強化的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可能是圍堵中共的一環。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參與亞太政治及安全事務的一項有利的屏障，美日安保條約亦有在亞太強權關係間維持平衡的隱含目的。^⑤一位日本學者指出，日本的戰略計畫中並沒有以中共爲對象的導向，日本的國內政治亦不允許如此做。中共一直反對美國在日本及南韓駐軍，更遑論美日安保條約。因此中共如何看待美日安保條約亦是影響日本長程安全政策的一項相當重要的因素。^⑥

二、與中共的交往及平衡：美國與東協的兩面策略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兩次大規模介入亞洲國家內的戰爭，一爲一九五〇年的韓戰，及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起的越戰，此二次軍事介入均相當程度的挫傷美國。因此，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於亞洲安全事務的參與，也顯得相當的謹慎。但是東亞國家快速發展的經濟，及東亞國家在追求政治民主化的表現，均符合美國所揭櫫的立國精神及其外交政策的目標，更關係到美國現實的政經利益，因此，即使在美國經濟實力遠不如昔及大幅裁減駐外軍隊的情況下，也迫使美國政府必須兼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長、短程國家利益。

冷戰的結束及蘇聯的解體使美國與中共缺乏了在戰略方面共同的制衡對象，且互相成爲各自在亞太地區的強勁對手，美中兩國維持著既期待合作共榮又心存警戒競爭的複雜關係。美國與中共在國際事務上雖然有很多兩國共同關切的問題，但卻也因爲兩國對同一問題所持之不同立場及看法而經常陷於對立。美中關係的最大交集是兩國持續增加的經貿關係，而美國過去能對北京在其他問題上施加壓力的籌碼就在於給與中共的最惠國待遇。雖然白宮與國會對如何運用最惠國待遇以迫使中共在人權及其他問題方面的改善時有爭論，使得最惠國待遇成爲美國對中共經貿政策的焦點，但是中共自從一九八〇年起卻也每一年都能從美國方面取得最惠國待遇。^⑦此舉也顯示美國在事關兩國現實利益時採取避免對抗的策略，並且仍寄望經貿的密切交往會成爲引導中共改革的手段。

中共毫無疑問的會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強勁的對手，美國政府也相當程度的希望採取避免與中共正面衝突的政策，所謂的「和平演變」及「建設性交往」的政策均著眼於此。但中共也不必然一定會成爲美國的敵人，此一問題端賴美中關係的互動而

註⑤ Yoshihide Soeya, "The Japan-U.S. Alliance in a Changing Asia,"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4 (Fall 1996), p. 269.

註⑥ *Ibid.*, p. 271.

註⑦ Robert Gar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49: A Troubled Affair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Ltd., 1994), pp. 197~200.

定，因此，誠如一位研究東亞的專家所言，「來自中國之威脅的潛在性是最嚴重的，但是敵意並非是註定的，美國不應以自己的行動將中國變成敵人。」^⑧柯林頓政府於一九九七年五月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策略更進一步指出，美國必須深化與中國的對話。^⑨

一九九七年十月柯林頓與江澤民的高峰會議則將美中關係往前推進了一步。江澤民成為從一九八五年以來第一位國家主席正式訪問美國，柯江高峰會議也象徵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美國對中共的經濟制裁及禁止美國高層官員訪問中共之政策的正式結束。也顯示美國對中共積極交往政策的確立，並想藉此化解中共對美國企圖「圍堵中國」的疑慮。兩國元首發表聯合聲明，將致力於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除了兩國元首間電話熱線的設置，並促使兩國高層官員定期互訪，就政治、軍事、安全及武器管制等問題進行磋商。

根據中共外長錢其琛的說法，中美兩國的合作性質與中國與俄羅斯及法國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不同，中俄有邊界問題須加以解決，中法的戰略夥伴關係則建立於未來的世界將朝多極化發展的共識之上。中共總理李鵬於一九九六年四月訪問法國，與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會談時即言，世界政治多極的趨勢比由一個超強掌控的情況更為安全。席哈克也指出：「世界從來就不應該被單一的國家或單一的集團所領導。」^⑩錢其琛認為，中美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則是因美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已開發國家，而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的合作將對亞太及國際有深遠的影響。^⑪

對於持續增強的軍事及經濟實力的中共，東南亞國家多希望中共能在多邊合作的架構下，發揮促進區域安定與和平的作用。因此，過去東協國家也一直希望中共能成為區域論壇的對話夥伴。東南亞國家與中共在南海諸島的主權有所爭執，原就對中共以軍事武力彰顯其對南海諸島主權主張的行動感到憂心，而中共在台海的飛彈演習，更讓東南亞國家對中共有所戒心。因此對於如何運用各種區域論壇或組織以約束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作為，就成為東協國家與中共積極交往的主要目標之一。

中共自一九七〇年代末採取經濟開放政策以來，經濟發展的速度及規模均令國際間側目，其外匯存底的數目到一九九六年七月時甚至超越台灣，以九百零八億美元成為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二位的國家。中共較以前更有能力來推動國防現代化，此點也一直是亞太國家相當關切的事項。亞太國家則由於中共經濟及軍事力量的日漸強大，也多不願在美中的齟齬中選擇支持的對象，深恐捲入美中對抗的情勢之中。東協更不願意也暫無此能力充當亞太權力平衡中的平衡者，目前東協成員既無此項軍事能力也無

註⑧ Richard Halloran, "The Rising East," *Foreign Policy*, No. 102 (Spring 1996), p. 20.

註⑨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The White House, May 1997.

註⑩ "China, France Seek Closer Ties," *Beijing Review*, April 29~May 5, 1996, p. 4.

註⑪ 「中美結建設性戰略夥伴」，星島電子日報，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http://www.singtao.com/spec33/ca103101.html> 及「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星島電子日報，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http://www.singtao.com/spec33/ca103106.html>.

經濟力量如此做。不過東協成員以過去經常能在國際問題上採取一致之政治立場的經驗，應可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集體的力量。其次，畢竟美國仍是惟一能在軍事上制衡中共的國家。美國與東協現階段對中共的政策可說是既交往又平衡的策略。

中共想成為亞洲強國的企圖心及潛力，亞太地區國家也表同等的關切，英國經濟學人週刊即曾報導：「中國的最後目標是在取代美國成為東亞最具影響力的強權。」^②中共於一九九六年三月於台海試射導彈飛彈事件引起區域內國家的高度關切，也促使中共體會到暫時必須與各國保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中國總理李鵬於一九九七年八月訪問馬來西亞時，即肯定東協在維持區域和平及促進亞太經濟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強調中國會加強與東協成員的關係。^③但若以較有可能影響中共在亞洲之國際地位的國家，除了上述美、日兩國外，俄羅斯的動向應仍是北京所相當在意。特別是中俄兩國仍舊有著綿延四千多公里的國界。除了雙方的邊界駐軍之外，中俄兩國邊境人民間的經濟活動往來也日益頻繁，因之而產生的人口移動及經貿糾紛等問題也必須加以正視。

三、俄羅斯與中共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美日關係的反平衡

雖然蘇聯的解體，讓亞洲國家認為俄羅斯在亞洲的軍事影響力已不若其在冷戰時代，但是俄羅斯仍舊保有遠東艦隊，軍事力量不容忽視。東亞國家對此點亦有相當的認識，因此，也使俄羅斯成為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的成員。俄羅斯因國內經濟的疲弊，並處政治民主化的轉型期，而專注於內政經濟的問題，自是顯而易見。俄羅斯也認為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經貿力量，不僅是目前且在未來的二十一世紀對俄羅斯很重要，俄羅斯領土橫跨歐亞兩洲，亦亟思能成為亞太經濟區的主要成員，因此俄羅斯亦早已表達希望能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④同時亦與中共、日本及南韓成立圖們江開發計畫。莫斯科更表示，希望加強開發西伯利亞及俄屬遠東地區以促進俄羅斯與東亞地區的關係。在冷戰時代被蘇聯視為是針對蘇聯的美日安保條約，也漸被俄羅斯所接受，俄羅斯前國防部長即曾正面的表示對美日軍事同盟的看法，也因此日俄間的關係的改善也才被以較正面的角度來觀察。^⑤

一九七〇年代中共所提的有關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項主要障礙已經加以掃除，中共認為與俄羅斯發展友好關係乃是中共促進二十一世紀繁榮的戰略選擇。不過中俄雙

註② “Will East Asia Keep Its Balance,” *The Economist*, July 26, 1997, p. 26.

註③ “Li Says China Seeks Stronger ASEAN Ties,” *Japan Times*, August 23, 1997, p. 1.

註④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於溫哥華舉行的亞太經合會的元首高峰會中正式通過讓俄羅斯、越南及秘魯成為亞太經合會的成員，並允許三會員國於一九九八年一月正式參與亞太經合會的各項活動。

註⑤ Peter Landers and Serge Blagov, “Warmth in Siber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30, 1997, p. 30.

方決定不建立同盟關係也不參與反對對方或反對第三者的衝突。^⑤此應有助於降低強權間藉軍事結盟而導致現狀之破壞的可能性。中俄兩國於一九九一年已簽訂有關兩國東邊之國界問題的協議，大幅改善了兩國從一九六九年珍寶島邊境軍事衝突以來惡化的邊境關係。兩國並同意朝限制邊境軍事部署及建立邊境互信之方向來進行合作。^⑥

中俄兩國進一步於一九九三年簽訂了一項五年的軍事協議，中共從俄國獲得不少尖端軍事科技的轉移，包括蘇愷二七戰機的技術轉移，也展開兩國高層的軍事與情報交流，已大幅降低來自俄羅斯的威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江澤民更成為中共成立以來，繼毛澤東之後第二位訪問俄羅斯的國家主席。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的二度訪問北京，及兩國的高峰會議更進一步大幅度改善兩國的邊境情勢。中俄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雙方決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平等、互信及互助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同意維持各層次及經由各種管道的對話，特別認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諮商非常重要。也因此，北京與莫斯科之間將建立電話熱線，雙方並進一步聲明除將繼續遵守兩國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及一九九四年達成有關解決兩國邊界問題的協議外，也將繼續談判其他未解決的邊境問題。^⑦在此一情況下，北京可專注於其與東亞國家之軍事安全關係。中俄的高峰會議所建立的「二十一世紀的戰略伙伴關係」，也大有與美日安保同盟互別苗頭的意味。^⑧

雖然中俄兩國均不認為與美國的正面衝突會為它們帶來任何好處，但是兩國均有意利用雙邊更密切的關係，做為制衡美國在東歐及東亞仍令人側目的影響力。俄羅斯因警覺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能將東歐及中歐國家納入該組織，其前國防部長葛拉契夫（Pavel Grachev）即言，莫斯科可以運用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做為一項反平衡的策略。^⑨俄羅斯對因美國勢力在歐洲的擴張而可能對俄羅斯安全造成的威脅，亦深感疑慮及不滿，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訪問莫斯科時與葉爾欽發表共同宣言，宣稱將追求一個無霸權的世界秩序，而此點也被認為是對美國擴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項反應，北京官方的新華社即批評美國藉著擴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強化美日安保條約企圖主宰整個世界。^⑩因此，俄羅斯未來在東亞地區的動向仍相當程度關係到亞太整體的安全情勢。

註⑤ 該三項障礙為：蘇聯的侵略阿富汗，越南的侵略高棉及蘇聯在中蘇及中蒙邊界部署重兵。見“Chinese and Russian Partnership Growing,” *Beijing Review*, April 29~May 5, 1996, p. 10.

註⑥ 有關中俄邊界問題的談判及達成協議之內容及過程的分析，詳見 Genrikh Kireev,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a Stable Border,”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No. 4, 1997, pp. 8~22.

註⑦ 中俄聯合聲明全文，請閱“Joint Statement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eijing Review*, May 13~19, 1996, pp. 6~8.

註⑧ John Zeng, “The New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July/August 1996, p. 6.

註⑨ “Comrades in Arm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 1996, p. 18.

註⑩ “Beijing hits out at ‘US domin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ternet edition), December 17, 1997, <http://www.scmp.com/news/template>.

肆、東協區域論壇與亞太的安全合作

冷戰結束後，多數的亞太國家也希望在區域穩定下，在安全問題方面尋求進一步的合作，直至一九九三年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亞太地區才有第一個可就軍事、政治、安全等問題對話之正式的多邊組織。東協於一九六七年成立時即以反共為共同的訴求，特別是中共對東南亞國家內部左派遊擊隊的支援，更讓東南亞的非共黨國家深恐骨牌效應的發生，而希望東協成員在政治問題上會採取一致的立場。印尼為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深知其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可能會因為加入東協而受到拘束，但是印尼還是選擇加入東協，並希望藉此能建立東南亞的區域秩序。東協成立後即一再聲明東南亞國家有決定東南亞秩序的權力，因此，從東協成立時的外在環境及東南亞國家內部的互動而言，東協的成立可說是隱含有權力平衡的動機。^④

東協區域論壇則由東協國家發起，成立於泰國的首都曼谷，最主要的目的即在強化亞太地區政治及安全方面的合作，因此，東協區域論壇在道德訴求方面彰顯其正當性。^⑤以東協成員為主而成立的東協區域論壇，與十九世紀歐洲基本上由強權主導之「歐洲協議」(the Concert of Europe)本質上有所不同，東協區域論壇是由區域內非強權國家出面聯合成立並主導，再邀請區域內強權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東協區域論壇本身並沒有設定特別的安全議題，不過，東協區域論壇自我定位為根據國際共同合作安全的原則，以發揮促進信心及安全建立措施和預防外交的功能。^⑥

東協區域論壇目前已有二十一一個正式的成員，可以說是一個有關亞太安全論壇的先驅。^⑦但是東協區域論壇成立之初，對於易引起對立及有關領土主權爭執的問題一向都避免觸及，從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的爭執、朝鮮半島的問題到台海危機，東協區域論壇均未詳加討論即可看出。^⑧目前，東協區域論壇的工作重點，仍在於建立區域內各國有關國防及軍事安全的對話管道，並希望藉常態性的對話來增加區域安全方面的合作。不過東協是相當重視東協區域論壇的功能，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主要為解決東協成員金融危機而舉行的高峰會議，發表了「東協二〇二〇年展望」(the ASEAN Vision 2020)，即強調東協區域論壇乃是一項信心建立、預防外交及尋求解決衝突

註④ Michael Leifer, *op. cit.*, pp. 9~13.

註⑤ 有關東協安全機制的演進，請詳李國雄，「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區域秩序」，問題與研究(台北)，第三十四卷第九期(民國八十四年九月)，頁二一~四〇。

註⑥ 同前註，頁二六~三〇。

註⑦ 目前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及對話夥伴計有，包括東協九國(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緬甸及寮國)、高棉、巴布亞紐幾內亞、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美國、俄羅斯及歐洲聯盟。

註⑧ 有關南海諸島主權爭執的問題，東協區域論壇於一九九五年召開之年會所公布的主席聲明中，即呼籲有關國家信守對於國際法及國際公約的承諾，並希望這些國家也能尊重一九九二年的東協對南海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請見 M.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p. 45. 此外，東協區域論壇於一九九六年七月所召開的年會中，也由東協七國呼籲各方自制並促進建立區域內行動的準則，以作為維持區域穩定的基礎。見“Security Emphasised as ASEAN Gears for Growth,” *Hong Kong Standard*, July 22, 1996, p. 7.

之已建立的手段。^⑦

不過東協成員對於區域內強權可能支配區域政治及經濟亦存有戒心，東協對中共的戒心，從東協不顧美國及歐洲等國家對緬甸軍人政權的批評，而於一九九七年讓緬甸加入東協一事即可看出。^⑧這項行動的目的被認為不在於想要讓緬甸加入東協來改變緬甸，而在於避免緬甸成為中共的勢力範圍。^⑨不過緬甸政治改革的缺乏進展與高棉的政變，也成為東協區域論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於吉隆坡所召開的年會中所主要討論的議題。

此外，東協成員對日本亦一直有所戒心，東協認為日本若在美日安保條約之外從事軍事行動，會是一項引起區域不穩定的因素。但是由於中共與東協的部分成員因南海群島主權的糾紛，致使東協對中共的關切卻勝過對日本的關切。東協也希望透過東協區域論壇與中共進行安全對話，試圖經由集體的力量，以多邊對話的形式，減少因中共擴軍對東南亞地區可能帶來的軍事威脅。^⑩同時也因日本在東南亞國家有相當大的投資，特別是在越南的投資，致東協內也有成員認為，越南之加入東協將有助於東協在和中共交往時的整體力量。^⑪

南中國海兼有重大的戰略及經濟雙重價值，據估計，在一九九三年世界上已有百分之十五的國際貿易經由此海域。目前中共與東協成員的貿易額也高達二百億美元，但東協對中共在南海的舉動仍相當警戒，特別是中共於一九九五年與菲律賓為美濟礁衝突之後，東協對中共更是戒慎。美國也曾針對南海問題表明，一旦南海發生軍事衝突，美國將護航並維持海運航行的自由暢通。美國太平洋指揮部司令普魯赫（Joseph Prueher）更於一九九六年四月訪問越南並與越南商討建立初步軍事關係的事宜。此外，美國軍艦更頻繁訪問菲律賓的蘇比克灣一事，加上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均可視為美國想維持南海暢通與穩定的企圖。^⑫

美國在亞太安全上仍具有關鍵性的角色，一方面美國須借助東協以保有美國進入東南亞市場的管道，另一方面，東協也必須借助美國來平衡中共日漸壯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東協區域論壇積極的促使美國成為成員，事實上，也有將美國納入使之參與亞太安全事務的目的。雖然東協區域論壇離發揮解決區域衝突的功能仍有一段距離，但以中共已成為其成員的情況下，對美國及東協各國而言，假以時日或許能強化這個多邊安全對話論壇的功能。

註⑦ “Leaders Look to Utopian Future,” *South Morning China Post* (Internet edition), December 16, 1997.

註⑧ 美國、日本及澳洲等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對讓緬甸加入東協一事加以批評，認為緬甸政治改革的速度過於緩慢，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甚至認為緬甸是東協國家的異數。見“All for On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7, 1997, p. 26.

註⑨ “Song and Dance Routine,” *The Economist*, August 2, 1997, p. 20.

註⑩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二三。

註⑪ Stuart Harris,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and Asia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1, No. 2 (Summer/Fall 1997), p. 139.

註⑫ 以上論述請詳見 William J. Dobson and M. Taylor Fravel, “Red Herring Hegemon: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urrent History*, Vol. 96, No. 611 (September 1997), pp. 258~263.

推動多邊安全對話，早已是柯林頓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重點之一，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甚至建議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能成為討論區域安全議題的組織，裴利於一九九五年底於在日本大阪舉行的亞太經合會之會議中建議，亞太經合會應擴充成為能討論安全問題的組織，他認為此項努力將可為亞洲建立互信的基礎。^③但是日本、中共、印尼、菲律賓及澳洲均反對這項提議。日本因其憲法禁止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至今未改變其反對集體防衛的政策。亞太經合會各會員的領袖亦有共識，認為亞太經合會仍應維持經貿組織的特質，一旦納入爭議性特大的軍事安全問題，恐會影響亞太經合會內部的團結。

美國強調多邊行動的方式來解決國際間的衝突，從波斯灣戰爭已可看出，一方面，多邊行動可使其他國家共同分擔解決國際衝突的負擔，另一方面，美國在領導解決國際衝突時，可獲得各國的奧援，及取得領導該行動的道德性與權威性。^④一九九六年初美中兩國關係因貿易、核子武器、人權及台海危機等問題而陷入低潮時，裴利亦曾建議亞太地區國家的國防首長應定期召開會議，以增進瞭解及促進合作關係。事實上，美國國防部已在一九九五年九月邀請亞太國家專司國防安全及外交的官員及學者舉行了第一屆的亞太安全會議，應可視為是朝向舉行亞太國家國防部長會議之目標邁進的初步。

東協區域論壇若得美日等強國的大力支持，應可增進其在促進亞太安全合作所能發揮的功能。日本以國民生產總值達四·六兆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不可避免的將增加它在國際政治上的參與及地位，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由於日本過去對亞洲國家的侵略歷史及目前尚有美軍駐日，因此在軍事安全問題上，日本均維持相當低的姿態。這一方面，美國應該是可以藉東協區域論壇此一多邊的安全架構促使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如此也可避免亞太國家對日本的疑慮。亞洲周刊（*Asiaweek*）的社論更指出，包括中國與北韓在內的亞洲國家實在沒有理由認為不能和日本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因為此類軍事演習當有助於亞洲國家的互信，一旦如此，則非但可強化東協區域論壇的功能，同時也可增進中日兩國關係的和諧，而中日兩國關係的和諧則是維繫東亞和平所不可或缺。^⑤

東協國家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六，供應日本進口原油的百分之十，及進口天然瓦斯的百分之八十。日本首相橋本於一九九七年一月訪問東協七國，即旨在強化日本與東協成員間的經貿關係。橋本並發表所謂的「橋本主義」，提議東協國家與日本定期舉行高峰會議，討論雙方的安全、貿易、經援及投資等問題。橋本並呼籲東協協助中國，使之成為東協的建設性夥伴。針對台海問題及朝鮮半島的局勢，日本外相池田信彥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間訪問東南亞國家時即表示，亞洲國家必須創設一項穩固的機制來促進互信。此外，半官方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亦可在有關區域安全

註③ Eugene Moosa, "U.S. Breaks APEC's Military Taboo," *The China Post*, November 16, 1995.

註④ Anthony Lake, "American Power and American Diplomacy,"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 2 (Summer/Fall 1995), pp. 90~91.

註⑤ *Asiaweek*, May 10, 1996, p. 22.

問題的探討、資訊的交流及互信的建立上襄助東協區域論壇。^⑤雖然台灣已表明希望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但是目前仍未被允許成為東協或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沒有台灣的參與，恐無法求得台海問題的真正解決。北韓雖亦不是東協的成員，但在美國的斡旋之下，包括中共及南北韓的四邊對談第一回合亦已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於日內瓦舉行。

綜上所述，中共，美國、日本和俄羅斯四國之間任何的互動都會影響亞太安全的情勢，同時也可能引起區域內國家的關切，而諸如東協區域論壇等多邊的對話組織則可減少雙邊關係在區域內可能引起猜疑的缺失。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安全的合作上，亦獲得區域內強權的正面肯定，中俄兩國甚至在一九九六年雙方簽定的聯合聲明中指出，東協區域論壇對於亞太區域內國家經由雙邊及多邊的安全對話，以增強區域的安全合作方面具有很大的意義。^⑥甚至於下一世紀在亞太安全問題上應會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印度，也已是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

東協區域論壇若欲在朝鮮半島及台海維持穩定及避免軍事衝突的發生，則應儘早讓北韓及台灣成為東協區域論壇的成員。同時也能讓相關國家在此一論壇內有增進交流及增加互信的機會。如同亞洲周刊所指出，就台灣本身所擁有之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及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的危機幾乎是亞洲當年最大之安全危機的此二事實而言，東協區域論壇即應設法使中共在繼續扮演其不可或缺之角色的情況下，儘可能邀請台灣參與。^⑦

有謂美日兩國應促成與中共的三邊安全對話，俾便讓中共瞭解美日安保條約並非針對中共而訂，但卻為維持亞太穩定所不可或缺。事實上，中共在冷戰結束後也已認知美日的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東亞區域安全的維持。^⑧而東協區域論壇可作為中美日與俄羅斯四強之間增加互信的媒介。有謂以長遠的觀點而言，美日安保條約或無法長存，因為日本不可能一直將本身的國家安全置於其最強大的經貿對手？美國的保護之下，特別是冷戰時代美日安保條約簽定時所要對付的共同敵人——蘇聯已不存在。而一旦南北韓統一，則外在環境更無由證明美日安保條約存在的意義，日本最終成為一軍事強權就似乎難以避免。在此情況下，多邊的區域安全機制就會愈發顯得格外重要。^⑨

伍、結 論

亞太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宗教傳統及語言風俗等，確實是比歐洲國家在商討有關安全、政治等合作上更為困難，特別是東亞國家間的領土主權爭執更不

註^⑤ 有關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主要對話範圍及工作內容，請詳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台北），第三十五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三～一三。

註^⑥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p. cit.*, p. 8.

註^⑦ “Editorials,” *Asiaweek*, August 9, 1996.

註^⑧ John Zeng, *op. cit.*

註^⑨ Rajan Menon,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 Vol. 5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7), p. 34.

容易在短時間內加以解決。而下述三項區域內的變化又被視為可能會加深影響整體亞太局勢的平衡：一是美國撤出在日韓的駐軍，二是中國大陸情勢的不穩定，三是在中國及日本興起過度及不當的民族主義。^⑥然而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經合會的成立，已分別為亞太國家間安全及經濟問題的衝突與合作，開啓了一項多邊的對話管道及機制，應也有助於預防上述之可能情況的發生。

亞太國家處此區域內安全情勢尚未明朗之際，仍會繼續著重於己身安全利益的維護，另一方面，則會更傾向於藉多邊區域論壇，加強對於有關領土主權爭執等問題的溝通。多邊對話論壇的興起已儼然成為亞太國家尋求共識的一個方法，例如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舉行的東亞元首高峰會議（包括東協成員、中國、日本及南韓）以商討解決東亞國家所遭逢之金融危機的辦法即又是一例。而東協區域論壇現階段所強調的有關區域內信心與安全建立的方式應會進一步獲得亞太國家的支持。或許東亞四強權間的互動，也能漸漸的被多邊的論壇及組織所規範，而降低四強互動對亞太安全情勢所可能帶來的衝擊。

從上述強權間的互動及多邊組織的運作，應可看出亞太多數國家已漸有了權力平衡及多邊對話乃是維持區域穩定必備之條件的共識。而維持國際情勢的穩定及各個國家的安全一直都是權力平衡所要發揮的功能。因此亞太的權力平衡，將會是建立於這項共識及共同利益之上。一旦如此，權力平衡就成為隱含有強權間志願合作之意義的一項制度。^⑦而亞太國家在藉由權力平衡所獲致之穩定的情況下，應致力於透過雙邊及多邊的安全對話及諮商的管道，並採漸進方式以建立安全合作方面的共識及做法。

東協區域論壇能否發揮多邊組織的功能也端賴區域內權力平衡的穩定狀況而定，如果區域內國家藉由外交途徑來加強因經濟互賴所形成的合作，則對於區域內的權力平衡也會有所助益。^⑧權力平衡做為維持亞太區域穩定的策略雖仍有許多缺失，但在此一多邊組織制度化之前，卻能發揮讓區域內強權不必過於擔心會產生區域霸權的作用。東協區域論壇也兼具讓較弱小國家可經由多邊的對話，並藉安全合作以平衡區域內強權的功能。當然權力平衡本身也有可能成為亞太安全情勢演變所形成之新的區域秩序，惟東協區域論壇在該情況下更可發揮約束強權的互動及降低強權互動所可能產生之負面影響的作用。長遠以觀，東協區域論壇未嘗不可能成為未來亞太地區邁向區域集體安全的第一步。

（收件：86年12月19日，修正：87年1月15日，接受：87年3月2日）

註⑥ Stuart Harris, *op. cit.*, pp. 140~145.

註⑦ 新現實主義者與傳統現實主義者對權力平衡看法的不同，前者認為權力平衡是一種自我規律及非刻意形成的國際體系的架構，而後者則認為是一項強權間志願合作的體制。詳見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David Priess, "A Tale of Two Realism: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Supplement 1 (May 1997), p. 12.

註⑧ Michael Leifer, *op. cit.*, pp. 57~58.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Practi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Vincent Wen-Hsien Chen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rovides us wit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observe security situ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teractions among big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should promote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region. In the long run, the ARF may be able to establish norms and rules for its members in handling regional political and security issues. Therefore, on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RF may someday become an institution serving a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Yet, practic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still has merit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Asia-Pacific before a new regional order is formed.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RF, strategic interaction

